

清代旅外徽商家族的人文情怀与文化贡献^{*1}

徐道彬

【摘要】:徽州地少人多,科举仕途与四处经商是明清时代徽州人摆脱贫困、追求富贵生活的两个重要途径。他们儒而不成则转而为贾,或亦儒亦贾,贾儒相济。经商致富的徽州人,热心文化事业,崇仰学术,“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清代前中叶,朝廷崇儒重道,稽古右文,受此影响,江南的徽商家族大量刻书,积极献书,为文化教育、学术研究及《四库全书》编纂都做出了杰出贡献。旅外徽商文化程度普遍很高,徽州的士子、商人和官僚三者是流动不居且混而不清的,他们凭借顽强不屈的毅力、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执着的文化追求,既为自己找到了生活门路、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也为寄居地学术文化的发展营造出浓郁的人文环境。

【关键词】:徽商;人文修养;徽州;徽学

【中图分类号】:K2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8)02-0007-09

明清时期,徽商在成为江南社会经济的中坚力量之后,缘于自己未了的“学而优则仕”的儒家功名情结,以及修齐治平的经世情怀,努力在思想文化方面施展才华与抱负。于是在寓居之地修桥补路,构筑园林、诗社,刊刻书籍,行医施药,为当地的城市建设和文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营造出丰富而深远的精神空间和文化氛围。这些旅外的徽商又非常尊崇乡贤朱熹,在所到之处建立紫阳书院或儒学会馆,用于交游和学习,不断提升自我修养和经营理念,相对于其他商帮的崇拜关公和妈祖而言,在文化修养和人文关怀方面都有所不同,故而博得“儒商”或“贾而好儒”的雅称。本文选取一些“亦儒亦贾”的旅外徽商家族,通过揭示他们的家族事迹、人文情怀和文化贡献,探讨清代旅外徽商家族在士与官、商的互动中所展示出的儒学情结与人文镜像。

一、贫而从商,富而为文

明清时期的徽州,人地矛盾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桐城方苞云:“徽郡在群山中,土利不足以赡其人,故好贾而轻去其乡,自通都大邑以及山陬海聚,凡便贾之地即家焉。”^[1]为了生存,科举仕途与四处经商就成为徽州人摆脱贫困、追求富贵生活的两个重要途径。如果儒而不成,则转而为贾,或亦儒亦贾,贾儒相济,由此而逐渐融合成士商家族一体化和地域共同体的生存模式,故戴震曰:“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为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风。”^[2]大量外出的人口逐步形成了徽州“商成帮,学成派”的地域特色,并且有了所谓“小徽州”与“大徽州”的兴旺鼎盛之势。

徽商以盐典茶木四业为经营主体,茶木两业是徽商的基础行业,盐业和典当业一般是在资产富有之后,所进行的成规模和高回报的经营产业。清代,两淮业盐者大多为徽商,在清中期八大盐业总商中,徽商占其一半。他们从垄断经营中牟利生财,“资产以千万计”,而后便援例捐官,议叙、候补和加顶戴者不在少数。清代的徽州盐商也由此崛起,称雄商界,再通过加强同乡联谊、姻亲攀带、官商互济的手段,逐步控制了运河沿线和江南地区盐业产、供、销一条龙的经营特权,成为领袖中国商界一个较长时期的标志和奇迹。然而,这些“由儒而贾”的徽商家族,内心从未熄灭过“学而优则仕”的热情,此时得到适合的土壤,由潜滋暗长到蓄势勃发,凭借雄厚的经济基础,捐资助学,兴建书院,雅集文会,刊刻典籍,为江浙地区的学术文化

¹**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ZX045);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2JJD750016);安徽大学徽文化创新2016年招标项目

作者简介:徐道彬,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学博士(安徽合肥230039)。

事业输入了新的内容和活力。

曾执两淮盐务牛耳四十年的商号“江广达”，其主人江春(1721—1789，字颖长，号鹤亭)即是歙县江村人，祖江演、父江承瑜皆先攻科举不成，转而经营盐业，以扬州为中心向四周拓展，至江春时，家业巨万，富甲一方。江春“性警敏，少攻制举，为王己山太史弟子。辛酉乡闾，以兼经荐，额溢弗售，弃帖括，治禹策业。练达多能，熟悉盐法，司盐政者咸引重之”。乾隆巡幸江南，尝于金山奏对称旨，解御佩荷囊，面赐佩带，晋秩内卿(“钦赏布政使衔，与千叟宴”)^[3]。作为一介秀才，江春当时虽未能中举，但“少攻制举”的知识结构和“练达多能”的人生修养，也使他在发达以后更为“喜吟咏，好藏书，广接纳”，“一时文人学士，如钱司冠陈群、曹学士仁虎、蒋编修士铨、金寿门农、方南塘贞观、陈授衣章、陈玉几撰、郑板桥燮、黄北垞裕、戴东原震、沈学子大成、江云溪立、吴桥亭烺、金棕亭兆燕，或结缡，或致馆餐，虚怀卑节，人乐与游。过客寓贤，皆见优礼，与玲珑山馆马氏相埒。所著有《黄海游录》一卷、《随月读书楼诗集》数卷”^[4]。江氏始终不泯的业儒情结，于此得以尽数展现。他在富甲一方后，延接名流，诗书风雅，盛极一时。并诚邀沈大成、杭世骏等主其家，常年诗酒唱酬，虽久“弃帖括”，但时刻不忘文人风雅。即使如戴东原、杭世骏之类的考据学家，他也欣然接纳，悉心交游，有诗云：“客自逢人日，春风满户庭。谈经曾夺席，倾盖即忘形。瓶放梅花白，樽开竹叶青。榜头标第一，争识伍乔星。”^[5]这种热心文化、崇仰学术的心态和行为，也是大多数徽商巨贾身上都存在的现象，只是江氏能够“奏对称旨”“晋秩内卿”，官商互济而称雄一地，尤为突出而已。江春除了集会谈经、礼贤下士外，在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期间，他以总商之职，积极配合官府，联络四处徽商社群，笼络藏书之家，为两淮盐政李质颖、两江总督高晋访求古籍，搜集图书，周旋调剂，出力甚多，因此也博得朝廷与盐政的特别赏识和嘉奖。

扬州的南河下街一带，为江氏家族在四处经营后的聚居之地，除了本土的江村，此处便是他们的第二故乡。江春从弟江昉(字旭东)，“性好学，气度渊雅，所居紫玲珑阁，名流萃聚，诗酒盘桓。词学跻宋人闾域，与鹤亭方伯同为物望所归。一时广陵风雅之盛，自马氏后以二家为坛坫主。而居心仁厚，能周贫友，于乡闾祠墓尤多捐助。尝综汉皋盐策，人以为利藪。公清洁自持，囊无赢蓄，至弃庐以偿宿逋”^[6]。江昉也是早年饱读儒家经典，因屡考不中转而弃儒经商，但仕途理想深埋于心，为日后的“士商合流”与“官商互济”埋下伏笔。著有《晴绮轩诗集》《练江渔唱》等，皆署“歙江昉旭东著”，颇为世人所传。自此以后，江氏家族繁衍，名流代出，坛坫无虚日。如江春之子江振鸿也是“孝友勤慎，凡敬宗收族，嘘植贫寒，悉如其父”，喜与文人学士交，座中文人雅士常满，如钮树玉、吴嵩梁、郭麟等皆常下榻康山草堂，极一时文酒之盛，又曾延请朱文藻、张椿年馆于家，并资助其完成《山左金石志》，而“自君亡后，邗江无风雅总持之人矣”。江昉之子江振鹭，承袭父荫，凭借故旧姻亲，驰骋商界，声名远播，虽日进斗金却崇尚儒学，心仪文化，善交天下文士名流，建宗祠，立书院，且有专门藏书楼，“谨饬能诗，工楷法，克承家学”，著有《莺花馆诗抄》数卷行于世。江氏数代亦贾亦儒，在外则驰骋商海，于内则诗文盛会，确乎极一时之盛。据《扬州画舫录》所载，江春同宗者尚有江晟、江进、江立、江兰、江昱、江恂等，子孙辈如江振鹏、江士相、江士栻、江德量等，皆或仕或贾，或儒或艺，在两淮寓居之地蔚然成势。他们早年都饱读诗书，最终却无法通过科举而入仕途，故在“富成名就”之后，即以各种捐助赈济的方式向朝廷捐官纳衔，以“富而优则仕”来弥补自己的人生缺憾。由此可见，徽州人向外图谋生计和事业的发展，打破了封闭的本土畛域，通过官、商、文的互助互济，加强了与外界的碰撞与交流。旅外徽商家族在江浙地区的经商和科举，一方面是寻找生存的路径，解决自身和家族的繁衍和发展，另一方面也给寓居之地的经济和文化带来新鲜血液，共同促进江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富足与繁荣。

信奉“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的徽州学子，自幼皆为科举仕途而奋斗，但因禀赋有差，多走“学而困则商”的治生之路，因此徽商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在进入江浙富庶繁华之地后，寻找商机，勤苦经营，待立足已稳，家资富饶，即“以儒术饰贾事”，广交联谊，联姻攀附，逐步融合于土著，形成独有的关系网络。与歙县江氏一同在扬州经营盐业且互为唱和的祁门马氏兄弟，也是“弃儒就贾”，以“计然之术，积其奇羨，遂至饶裕”，而“以高贤称里中”，有“扬州二马”之称。马曰琯(1688—1755)、马曰璐(1695—1775)兄弟虽不及江氏富有，但“稽古能文”“名闻九重”，对外开放“丛书楼”的珍贵藏书，编辑《韩江雅集》和《林屋唱酬录》，刊刻“马版”经史小学与古诗文集等，都深刻地影响到当时的江南学者与学风。马氏家族以盐业致富，以藏书起家，尤以“小玲珑山馆”为中心的“邗江诗社”，聚集了当时许多一流的文人和学者。他们或性耽山水，驰骋才艺；或澹泊仕进，酷嗜典籍，各呈才学，竞相争艳，促成了扬州在乾隆时代学术文化的核心地位与深远影响。

阮元称“征君昆弟业鏖，资产逊于他氏，而卒能名闻九重，交满天下，则稽古能文之效也。当时拥重资过于征君者，奚翅什伯，至今无人能举其姓氏矣”^[7]。可见“富在一时，名存后世”，徽商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确乎与其他商帮纯为金钱的生活不同。这就是儒家“三不朽”思想在徽商身上的切实现，也是徽商屡为今人着力研究的原因所在。

“二马”家族自祁门移居扬州做盐业生意，维持生计，因无法“寄籍”，故“二马”早年欲考秀才，还得奔回祁门应试。祖父马承运生三子恒、谦、勋，皆继承父业，奋力从事“盐坨子”。其中，谦有四子（曰康、曰楚、曰琯、曰璩），皆少年苦读，以企隆起家声。曰楚贡入国子监，候选儒学教谕，娶妻汪氏，乃福建布政使汪楫之孙女，由此而成官商联姻之势^[8]，马氏家族才逐渐富强起来，加之“二马”崇敬儒学，醉心文史，广延四方好学之士，由此名满天下。据《清史列传》载：“扬州二马”家有藏书楼，见秘本必重价购之，或世人所愿见者，不惜千百金付梓，藏书甲大江南北。四库馆开，进书七百七十六种，优诏褒嘉，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并《平定伊犁金川诗得胜图》。有园亭曰小玲珑山馆，四方名士过者，辄款留觞咏无虚日。全祖望、符曾、陈撰、厉鹗、金农、陈章、姚世钰皆馆其家，结“邗江吟社”。高宗南巡，幸其园，赐御书及诗，海内荣之^[9]。马氏的小玲珑山馆是接待文人墨客的悠游场所，其藏书极富的“丛书楼”供文人学士浏览和研究之用。座中常客杭世骏尝称马氏不以俗学缮性而志不求时名，清思窈渺，超绝尘埃，亲贤乐善，唯恐不及。方闻有道之士过邗沟者，以不踏其户限为憾事。其创办的“邗江雅集”吸附文人、怀远学者达数十年之久，蔚成扬州文学群体的欣欣向荣之势。

“扬州二马”在文化上的贡献，除了博学好古及考校文艺、嘉惠士林之外，他们对于《四库全书》的编纂，在当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带头和鼓动作用，充分表现出文化商人的儒学情怀与文化自觉。

自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始，朝廷下诏从全国各地征求书籍，因多种原因而效果不佳。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初三日，朝廷下旨“谕军机大臣著李质颖查访淮阳马姓等家藏书借抄呈进”中有：淮扬商人中颇有购觅古书善本弃藏者，而马姓家蓄书更富，于四库所储实有裨益。须派总商内晓事之人如江广达等，令其因亲及友，广为访借^[10]。同月二十日又有“两淮盐政李质颖奏解送马裕家书籍折”，称马裕家族知悉征书之事，“欣喜踊跃，即将书目呈出”，并附马裕秉称：商人受皇上培养深恩，沦肌浃髓。今蒙购访遗书，商人家里所藏苟有可采，得以仰邀睿览，已为非分之荣，何敢复烦抄缮，致需时日，只求将原书呈进，便是十分之幸了。朱批：俟办完四库全书，仍将原本发还^[11]。翻检《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可以看到，前列数十条地方大员所上奏折中，涉及“马姓”“马裕”或“江广达”者竟达十条之多，可知马氏当时也曾风云一时。据翰林出身的两淮盐政李质颖奏称，从马裕家藏的全部1385种图书中，分前后三次共择取776种，当为私人献书最多的纪录。马氏也以朝廷官府亲征自己的藏书为荣，于是“感激天恩，乐于从事”。据李氏奏报：传谕该商，即欣然将书目呈出，及至借抄之际，又再三稟请，恐稽时日，求将原书呈送，是其感激天恩，乐于从事，出自中心之所诚^[12]。有幸的是，今天我们还可以在《四库全书》中经常翻到“两淮马裕家藏本”的字样，这便是对“扬州二马”的最好纪念，也标志着旅外徽商家族对朝廷编纂《四库全书》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因此，乾隆上谕予以嘉奖道：“今阅进到各家书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两淮之马裕四家，为数至五六七百种，皆其累世弃藏，子孙克守其业，甚可嘉尚。因思内府所有《古今图书集成》，为书城巨观，人间罕觐，此等世守陈编之家，宜俾专藏勿失，以裨留贻。”^[13]其中鲍士恭和汪启淑皆歙县人居杭州者，私家献书最多者四家，而旅外徽商占其三。此外尚有汪如藻、汪汝璥、汪承霈、程晋芳、吴玉墀等皆各有所献，也是徽商家族对于《四库全书》编纂以及典籍保护和文化遗产的别一种贡献。

这些崛起于江浙地区的旅外徽商，因贫而从商，渐富而为文，凭借才华与实力，不仅摆脱了物质生活之困与精神寄托之穷，也实现了自己人生价值的自足世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科举仕途所能获取的物质需求和精神境界。这在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确乎是个颇为引人瞩目的现象。余英时曾对此有所探讨和阐释：“十六世纪以后，商人确已逐步发展了一个相对‘自足’的世界。这个世界立足于市场经济，但不断向其他领域扩张，包括社会、政治与文化；而且在扩张的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其他领域的面貌。改变得最少的是政治，最多的是社会与文化。”^[14]文化商人在有了充裕的自足世界后，便要实现自我“士大夫化”，他们不可能在精神层面上始终做士大夫的“附庸”。因为“商人是士以下教育水平最高的一个社会阶层，不但明清时期弃儒就贾的普遍趋势，造成了大批士人沉滞于商人阶层的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商业本身必须要求一定程度的知识水平。商业经营的规模愈大，则知识水平的要求也愈高”^[15]。如果说“官商互济”是徽商得以猎取财富的主要途径，那么“士商合流”

则是徽商能够在思想文化界开疆辟土的重要因素，即使不排除他们“附庸风雅”的嫌疑，“贾而士行”的结果已经让他们进入文人与学者的领域，并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物质需求和精神支柱。所以，在清代的江南地区，士与商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了：一方面是儒生大批地加入了商人的行列，另一方面则是商人通过财富的运作，也可以跑进学者文士的阵营里来^[16]。

二、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徽州声名最大的世家大族汪氏，不仅在徽州本土人丁兴旺，势力强盛，在江浙地区经商的也人数众多，影响一时。尤其是在科举和教育文化方面，无论本土或寄籍士子，更是人才济济，蟾宫折桂者不乏其人。戴震一生素性狷介，矢志于学问，因与同族豪强结仇而终生流离失所，他与本土人士交往最多者即为汪氏，如汪梧凤、汪应庚、汪元亮、汪棣等。汪梧凤(1725—1773，歙县西溪人)家族经营盐业于江淮与京师，经其祖汪景晁、父汪泰安等数代的勤苦经营，终为巨富，并于本土建私家园林“不疏园”，以为私塾教育和书院研究之用。至梧凤及其子孙辈，在四处经商之余，乃以不疏园为学术园地，购买和刊刻书籍，邀集本土学者江永、戴震、程瑶田、金榜、汪肇龙、胡受穀、洪榜兄弟等一批崇尚实学的宿儒学子在此攻读经史之学，外地名流如郑虎文、刘大櫟、汪容甫、黄仲则等也曾聚集于此，逐渐成为“皖派”学术的发祥地。汪应庚(歙县潜口人)侨居扬州，自祖父辈即业盐于两淮，积资巨万。应庚继承家业，而不忘修身，尤通晓经史文艺，道德学识皆有可称，且乐善好施，为扬州学宫出资修缮，并捐赠学田与银两，备制祭器、乐器，以田租充实学府膏火，剩余者贮于公府，在大比之年分发士子以为资斧。戴东原为之作《江氏捐立学田碑》以志表彰，朝廷援例赐光禄卿秩衔。其子汪起，孙立德、秉德皆富而好施，为众商所推重，“虽为贾者，咸近士风”，体现了旅外徽商家族对于慈善事业和传统学术文化事业的扶持与尊崇。

“贾而好儒”的汪棣(字鞞怀，号对琴，歙县人)是一位寄籍仪征的徽州盐商，承继家业，刻苦读书，由廪贡生至刑部员外郎，著有《持雅堂集》，与卢见曾和李斗为挚友。卢氏邀集宴饮，商人不得参与，唯汪棣与之。李斗载其事曰：“工诗文，与公(卢氏)为诗友。虹桥之会，凡业鹺者不得与，惟对琴与之。多蓄异书，性好宾客，樽酒不空，一时名下士如戴东原、惠定宇、沈学子、王兰泉、钱辛楣、王西庄、吴竹屿、赵损之、钱箴石、谢金圃诸公，往来邛上，为文酒之会。子晋藩、掌庭皆名诸生。”^[17]汪棣学问虽不出众，但善于经商，且雅好文章，对当时的饱学之士甚为关怀，对学术文化事业颇有贡献。《清稗类钞》记其事云：“惠定宇尝病于扬州，医言欲饵参。定宇贫窘，不可得。时歙人汪对琴比部棣亦侨居邛上，雅重定宇品学，慨然购上品紫团参持赠，值千金。定宇病起，举所撰《后汉书训纂》初稿及善本尽以贻之。比部不欲攘美，什袭珍护，屡思梓行，而绌于力。以同里陈氏喜藏书，因付以善本，而自留原稿。后桐乡冯氏所刻《后汉书补注》，即此本也。”^[18]可见汪氏施善不求报，重学不掠美，其学其行可与“扬州二马”相媲美。其家族子弟也多博雅好古，精于诗文。其子汪光羲(字晋藩，号芝泉)少承庭训，博览群经，俭而好礼，与弟汪掌庭同为名诸生，以文学知名当时，与汪中、焦循、顾起尊等友善，往来谈艺，契若金石。汪氏一族亦贾亦儒，居心仁厚，敦本尚义。这种崇儒重道行为，乃欲在精神层面达到更高的境界，知生之意义、活之追求，也是近世以来士、商格局上的一种新变化。因此之故，文人入商或者商人入文，都加速了士与商在各自发展层面上不自觉地互为转向与融合。

因新安江水路的畅通，徽商在浙江经营者尤多。如休宁溪口的汪淇行就在桐乡经营盐业多年，家资富饶且又瓜瓞绵绵，斥巨资聘请塾师培育子孙，逐步繁衍成一族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有突出贡献的旅外徽商典范。子四，熏、文桂、文梓、文柏，皆儒雅好学，才华出众，尤以后三者为优，黄宗羲赞之为“汪氏三子”，并为之作《汪氏三子诗序》。据阮元辑《两浙轩录》载：汪文桂，桐乡岁贡生，官内阁中书，有《鸥亭漫稿》《六州喷饭集》。汪文梓(又名汪森)，官户部郎中，有《小方壶吟稿》。汪文柏，官北城兵马司正指挥，有《柯庭余习》《古香楼吟稿》^[19]。文柏著作由其子兆鲸、兆鳌刊刻，皆署“练江汪文柏季青”。此家族旅外汪氏由商贾转而好儒，以治盐兴家业，以科甲隆门第，至此走上了“富而能学，学优则仕”的光明前程。据《清史列传》载：“(汪)森少工韵语，与嘉兴周箕、沈进相切磨。既复与黄宗羲、朱鹤龄、朱彝尊、潘耒诸大师商榷，艺业益进。乃营碧巢书屋以当吟窝，筑华及堂以宴宾客，建裘杼楼以藏典籍，海内名士，舟车接于远道，诗名籍甚。”^[20]“裘杼楼”中贮书万卷，“四方名流企其风尚，挈舟至者履且满”。汪氏家族从休宁流寓桐乡，至汪文桂之孙汪上堉，又迁至秀水，多年后才得以正式占籍。汪森所著《小方壶存稿》和《文钞》皆署“休阳汪森晋贤著”，可知其始终心怀乡情，不忘初心。汪氏历经数代盘桓于士商之间，能文者从儒，能算者经商，人各有志，各行其是，除繁荣了当地经济和富足家产以外，在诗文创作、学术研究以及

《四库全书》的编纂方面，都有积极而显著的成就。至汪上埏的两个孙子汪如藻（翰林学士、四库馆提调及纂修官）和汪如洋（状元、四库纂修及分校官）时，汪氏家族达到了辉煌的时代，宗族的各个分支中都有许多士与官人数的增加，应当与其自家建有“碧巢书屋”和“裘杼楼”的典藏文籍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嘉兴府志》载：“秀水汪孟字康古，弟仲字丰玉，家故饶，至孟时渐落，而先世裘杼楼万卷之藏书故在，孟兄弟搜讨其间。乾隆庚午，孟兄弟举于乡，丙戌，孟成进士，有《厚石斋诗集》，仲有《桐石斋诗集》。孟子如藻，字念孙，举人，值四库馆开，献家藏书一百三十七种。乙未成进士，入翰林，终山东粮道。如洋字润民，为仲后，乾隆庚子会试、廷试皆第一，授修撰，年四十卒。”^[21]汪孟有子如藻、如澈、治猷、承泽，父子相承，兄弟蝉联，互为倚重，无论进学或经商，其家族成员在经济基础、社会地位、地方声望方面皆得到认同，尤其在藏书、刻书、献书及其子孙参与传统古籍的整理与研究方面，都为文化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叶昌炽赋诗赞曰：“绥若安裘晏若杼，揽环结佩君子居。司城岂必为贫仕，本读司空城旦书。”^[22]因商而富学，以学而隆家，既可维持富裕的生计，又能获得社会地位和声望，成为无数家庭羡慕和追求的最佳生活范式。在一个世代繁衍的徽商大家族中，官吏与士农工商各色人等皆有，同宗之内父子、兄弟之间的相互资助和彼此扶持，又使这“亦儒亦贾”的复杂关系长期处于融合状态，“士商混一，官商不分”便是清代旅外徽商的一个重要特点。

与汪森同宗，且几乎同时到达杭州经商的还有汪启淑（字秀峰、慎仪，号切庵，歙县绵潭人）。其祖父辈以经营盐业致富，建有“开万楼”，藏书甲江南。富而好学，贾而又仕，援例捐资为工部都水司郎中，迁兵部职方司郎中。又因工诗文，癖篆刻，喜好藏书和刻书，故常与杭世骏、厉鹗、程晋芳、翁方纲等文人学士相唱和。平素酷爱金石文字，搜罗周秦至宋明各朝印章数万钮，又建“飞鸿堂”贮之，自号“印癖先生”。著述有《水曹清暇录》《飞鸿堂印谱》《汉铜印丛》等，自署“天都”“新安”“古歙汪启淑切庵撰”，以示怀乡之谊。汪氏以一人之力，积三十余年，钤拓众多古印谱，又汇辑钤录当时篆刻，承继西泠印社诸子之轨，为繁荣清代艺术创作和浙派篆刻持续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四库全书》开馆之时，汪氏又与马裕、鲍士恭等徽商一起，进奉“精醇秘本”，“并邀宸奖”，成为一时朝野遍知的佳话。其中《建康实录》和《钱塘遗事》两书，乾隆“亲题二诗以赐”，自然会对寓居之地的文化生活产生深切的影响。在汪氏家族之内，甚至闺门女士也钟爱文艺，喜好金石。其女汪玉英为大学者洪榜之妻，酷爱鉴赏，彬雅多闻，著有《吟香榭初稿》；婢女杨瑞云、金素娟，善模仿，嗜古成癖，并能治印；其孙汪其佩醉心古金乐石，擅长考订，望古遥集而思前哲风仪，曾辑《飞鸿堂小成》《集古小成印谱》等，皆由名士梁同书为之作序。综观汪氏一族，虽然未能如汪如洋家族以科举入仕而光耀，但仍能以“并邀宸奖”而驰名于学术文化界，“行则以商，处则以学”，同样实现了个人的理想人生和光宗耀祖的生命追求。故叶昌炽咏颂之曰：“社散南屏寺里钟，年华终贾骋词锋。书船何似玉川子，雪压短篷过五茸。”^[23]字里行间洋溢出真实的写照和真诚的赞誉，而从汪氏家族的人文情怀与精神修养上，我们也确实看不出他们是商人还是文人了。

诚然，在科举场屋中，并非每个应考者都能金榜题名；在激浪翻卷的商场里，能够像巨富二马和江春之辈者也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徽商既无世代积资，又无权贵相助，多半是以维持生存而图谋发展，如果略有结余便是幸运之家了。这些人都是先走读书科举之途，有着相当高的学识水平，进学不成而“弃儒就贾”“从医”“从艺”，但时刻不忘仕途功名，要么继续科举，或是纳钱捐个“候补主事”“候铨教谕”之类的闲官虚职，借以光耀门楣、慰藉祖宗，而科举正途和翰林牌坊始终是徽州人永远的梦想和追求。今唐模村耸立的“同胞翰林”坊，即康熙皇帝旌表许承宣、许承家兄弟所赐之恩荣，是许氏家族“学而优则仕”的历史丰碑，也是徽商“贾而好儒”的真实写照。许氏兄弟之父许明贤，字仲容，歙县唐模村人，少时刻苦读书，长则业盐于江都，虽为贾人而好儒术，为人敦笃恺悌，富而博施。又斥巨资延师课读家族弟子辈，于是科第蝉联，隆誉两地。其子承宣、承家兄弟二人俱中康熙年间进士，授翰林。兄承宣，康熙十五年（1676）丙辰二甲第三十一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官工科给事中，典试陕西，著有《宿影亭稿》《青岑文集》《西北水利议》。弟承家，康熙二十四年（1685）乙丑二甲第六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充会试同考官，著有《猎微阁诗文集》。父子三人“并祀乡贤”^[24]。王渔洋有诗云“云间洛下齐名士”，即是赞誉许氏家族一门风雅，父祖经商致富，子孙科举隆家。至清末，唐模许氏一族仍枝叶繁茂，俊才迭出，他们的祖先在商场激战后凯旋归里，或建书院，在书声琅琅中传道授业；或造庭庐，在白墙黛瓦间退隐自守，于万般喧嚣之后归于平淡。

与许氏同在扬州的同乡巴氏，拥有最知名的“巴总门”，此乃盐商巴慰祖、巴源綬的宅第，也是旅外徽商巴氏宗族的聚居地。巴氏一族自巴廷梅始，寓居扬州业盐，家业与人口逐渐壮大，或儒或贾，亦儒亦贾，渐至闻名。至巴慰祖（1744—1793），

早年读书科举和中年经商营业皆未如意，不及其兄源绶经营顺畅，于是凭兴趣转而钻研书画篆刻，旁及钟鼎款识、秦汉石刻、古画器物，渐有所成，著有《四香堂摹印》《百寿图印谱》传世。因好古收藏和周济学友，加之捐官候补中书，由是大亡其财。晚年以替人作书治印维持生计，卒年五十。《扬州画舫录》载：“巴慰祖字禹（予）籍，徽州人，居扬州，工八分书，收藏金石最富。”“巴源绶字金章，歙县人，慰祖之兄。长来往于扬州，以盐策起家。好游湖上，家有画舫。子树恒，字士能，世其业，运盐场灶多奇计。”^[25]其子侄辈巴树谷、树烜、树民、树恒、光荣及外甥胡唐，在经营生意之暇，皆以金石篆刻和书法绘画享誉周边。巴氏一族皆通文艺，精鉴赏，富收藏，慰祖治印尤宗程邃，喜用“涩刀”，印款多用行楷，清秀明快，冥合自然，字里行间力摹古玺汉印，仿青铜彝器，能得汉印精髓，览之者不能穷其趣，近人黄宾虹等谓之“皖派”^[26]。巴氏是盐业世家，贾儒相通，迭相为用，他们展现出的商人“士大夫化”，抑或士大夫的“商人化”，已经不分彼此，模糊不清，颇令人回味。巴氏子孙辈也因酷爱金石文字、古篆六书而不能安心经商，家道中落后，多为人作书篆刻以自给。现今的巴总门地带或存或毁，无复当年的盛况，但其幽长的巷道还可令人想象到昔日旅外徽商家族的鼎盛风貌。

三、贾而好儒，留名青史

明清徽商的主要去处，是因水路交通之便而大多落实在江浙荆楚地区。扬州是水陆交通枢纽，距江南乡试考棚所在的江宁很近，又是两淮盐运漕运中心，自然成为徽州士子和商人的聚集之地。清末吴江陈去病曾在徽州任教职多年，竟称扬州是徽商的“殖民地”，自有其道理在。翻阅李斗《扬州画舫录》，所记人物及其轶事也多与徽州人士有关，所称“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篠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27]，而此中三姓皆为徽商家族。

程氏为徽州大姓，寓居扬州“篠园”的程氏望族，以歙县岑山渡人程文正、程梦星“父子进士”最为显赫。文正祖父程量入、父程之模均在扬州从事盐业，家境富饶，资本雄厚，便着意于子孙由科举仕途而光宗耀祖。十数年后，族中士子科第簪缨，人才辈出。李斗《扬州画舫录》曾以长文铺陈梦星一家脉络曰：“父名文正，字笏山，江都人。工诗古文词，善书法，康熙辛未进士，仕至工部都水司主事，著有诗文稿。公名梦星，字伍乔，一字午桥，号泂江，又号香溪。康熙壬辰进士第，官编修，著《今有堂集》。诗格在韦、柳之间，于艺事无所不能，尤工书画弹琴，肆情吟咏。每园花报放，辄携诗牌酒榼，偕同社游赏，以是推为一时风雅之宗。”梦星喜交游，善著述，为诗坛盟主数十年，著有《今有堂集》《李义山诗注》《平山堂志》等，主纂雍正《江都县志》。据家谱和村镇志资料载，程梦星的侄辈又有杰出之士，如程名世、程晋芳、程敦、程茂、程卫芳、程鸣、程志乾等等。程名世与杭世骏、厉鹗等为文友，工诗文，著有《思纯堂集》《左传识小录》《国策取譬》等藏于家，曾与叔父梦星编辑《扬州名园记》。有子四：赞和，丁酉选拔；赞宁，乙卯恩科副榜；赞皇、赞普，皆诸生^[28]。程敦，以业盐而致富，工诗文。程茂、程卫芳，皆工诗文，有专集行于世。程志乾，工诗词，因《七夕诗》句“人当别离真难遣，事纵荒唐亦可怜”而驰名于世。程鸣，邑庠生，工书画，深得王文简和朱彝尊的赞誉。至程梦星的孙辈人物，客居扬州者尚有“程沆，字晴岚，进士，官庶吉士。弟洵，字邵泉，官舍人，为午桥侄孙，皆工诗文”^[29]。程氏“由贾而仕”，渐至于“亦贾亦儒”，程梦星时家族最旺，于是构筑二十四桥旁之篠园，广植芍药、荷花、翠竹，亭榭处处，乱石间之，马曰琯赠之以竹，方士庶为绘《赠竹图》，因以取名“篠园”，一时传为佳话。其后程姓人物多在此聚会游赏，推为一时风雅之所。程名世、程晋芳等常馆于此，而胡复斋、马曰琯、方西畴、余元甲等也常来此雅集。

岑山渡人在扬州者以程梦星为核心，他承上启下于内，而又贯穿左右于外，无论是官僚商人，或是文人学者，经其笼络运作，逐渐构建起以篠园为核心的程氏家族经济运行网络，尤其以诗文创作和学术研究为主要特色。袁枚称：“淮南程氏虽业禹策甚富，而前后有四诗人：一风衣，名嗣立；一夔州，名崑；一午桥，名梦星；一鱼门，名晋芳。”^[30]程嗣立，工诗文书法，康熙诸生，兼通医算，雍正时举博学鸿词不赴。程崑，康熙癸巳进士，官职方司主事，迁刑部郎中，著有《二峰诗集》。其兄程璫，曾入漕运总督蔡士英幕府，著有《岑楼咏物诗》。可见程氏子弟不论经商或问学，在从商之余大多酷爱文史，雅好诗文。他们既是两淮盐商群体的重要成员，也有以科举文章显名于时者，甚至有参与《四库全书》编纂之功臣。

如果说以程梦星为核心的士商兼顾的地方绅士，带动了旅外徽商家族在经济文化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那么，以程晋芳（1718—1784，岑山渡人）为代表的学者，又在更高层面上为学术研究事业做出了更重要的贡献。程晋芳为梦星之侄，承接祖上资产，

以商养儒，以儒取仕，“问经义于从叔廷祚，学古文于刘大櫟，与商盘、袁枚唱和诗文，并擅其胜。江淮老宿咸与上下其议论”^[31]。其祖父以盐策起家，家资殷富，重视子孙科举仕途。晋芳兄弟三人，“接屋而居，食口百人，延接宾客，燕集无虚日”。史料载：“鱼门祖居新安，治盐于淮。乾隆初两淮殷富，程氏尤奢侈，君独愔愔好儒，罄其资购书五万卷。君耽于学，百事不理，又好周戚友，付会计于家奴，了不勘诘。以故虽有俸给，如沃雪填海，负券山积。赴陕谋于中丞毕公，索逋者呼噪随之。君已衰老，遂没于陕。”^[32]程晋芳曾以“岁壬午应召试列第一，授内阁中书，乃悉弃产，偿宿逋，携家北上。辛卯成进士，授吏部主事。癸巳岁，高宗纯皇帝允廷臣之请，特开四库全书馆，妙选淹通硕彦，俾司修纂，君与其列。旋以馆阁诸公校核讹错，皆罹薄谴，独君所手辑，毫发无疵。书成奏进，纯皇帝素稔君才，仰荷特达之知，改授编修”^[33]。程氏喜招四方缀学之士，居家相与探讨，家中豪奢声华，四方名流唱和无虚日，终罄家业。“才难问生产，气不识金银”，祖业败尽，“无以举火”，最后财尽家散，债台高筑，避难于西安，以至穷老而死，由毕沅“经纪其丧，贍其遗孤”^[34]。有幸的是，其子程瀚、程溧能够继起家声，重振门户，且将其诗文著作汇集刊刻，广传于世。要之，程氏生性好谈学问，不善经商，却为学术研究赢得了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其《礼记集释》《勉行堂诗文集》等许多著述都是在他“悉弃产”而痴迷于学问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他参与《四库全书》的编纂，且从家藏典籍中选出百余种秘籍之本奉献于朝廷，更体现出他对于学术文化事业的不懈追求和崇高的人生境界。

程晋芳属于典型的“亦贾亦儒”而又醉心学术之人，自言：“余自壬午入都，与族祖绵庄先生别，嗣是一岁中必书问五六至，虽间隔数千里，不啻执手亲面之勤也。”^[35]程廷祚(1691—1767，字启生，号绵庄)为程晋芳同宗，寄籍江宁，其祖自新安之槐塘迁金陵。父京萼，经营之暇能诗工书。初时家极贫，恒书屏幅易薪米，日闭户课两儿，俾习洒扫应对之节。客来，进鸡黍，侍立左右，如古弟子职。凡十三经、二十二史、骚选、诸子百家之书无不读。虽为一介商人，在生存问题尚未优裕的情况下，却以极强的毅力和信心教育子孙懂得儒家诚正修齐之法，确乎与众不同。故廷祚与弟南耕治学，皆以经史为重，“恒自谓文所以辅道，自汉唐以来，儒生泥典故，为训诂学，而不能变化以随时，其高谈性命者，又或蹈空疏，罕裨实用。于是以博文约礼为进德修业之功，以克己治人为格物致知之要，天文、輿地、食货、河渠、兵农、礼乐之事，靡不穷委探源，旁及六通四辟之书，得其所与吾儒异者而详辨之。盖自国初黄梨洲、顾亭林两先生歿后百有余年，大儒统绪几绝，继之者惟先生”^[36]。廷祚兄弟继承祖之业、父之志，一面以经商维持生计，一面也不忘立名德、建功业，思想上“以义为利”，行为上“贾道儒行”。弟南耕有经世之才，后“佐大僚幕数十年，所得脯脩与兄共之，无少别异”。廷祚则专心学问，著述等身，其《大易择言》《尚书通议》等皆为不朽之作，而《晚书订疑》即与阎氏《尚书古文疏证》一起，为《伪古文尚书》下定讞，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留下灿烂一页。

徽商的“士大夫化”使得他们与众不同，其诗文博雅和经史才华已经充分展现于诗文创作、艺术鉴赏、学术研究和其他文化活动中。尽管他们是“贾而士行”，抑或“士而贾行”，只要能将生存手段与文化贡献结合平衡到最佳状态，那就是人生之大成功。以刻书为生存职业，竟以《知不足斋丛书》而“奉旨赏给举人”的杭州大藏书家鲍廷博(1728—1814，歙县长塘村人)，就是这种典范。

鲍廷博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旅外徽商，虽然从其祖父辈起皆长久寓居桐乡，但始终未得“寄籍”，故科举应试时还得返回原籍歙县。鲍廷博祖父鲍贵，经营冶铁生意；父鲍思翊，少喜读书，习会计，亦欲科举而未达，流寓浙中，继承冶坊家业，渐至富饶。因留意搜集图书，教育子女，于是逐渐发展成为图书收藏与刊刻书籍事业。至鲍廷博时，又“以父性嗜读书，乃力购前人书以为欢”，修建“知不足斋”以藏书，汗牛充栋，远近闻名，且题名郡望皆以“古歙”为标识，以示乡梓情结。至朝廷为编纂《四库全书》而四处征集古籍时，廷博即以其子鲍士恭的名义进献图书数百种，从而“名闻当世”。阮元曾叙其家世和事迹云：“君幼而聪敏，事大父能孝，念父游四方，恒以孙代子职，得大父欢。大父卒，既葬，君父携家居杭州。居事父又以孝闻。以父性嗜读书，乃力购前人书以为欢。既久，而所得书益多且精，遂哀然为大藏书家。自乾隆进书后，蒙御赐《古今图书集成》《伊犁得胜图》《金川图》。四十五年，南巡狩，迎銮献颂，蒙赐大缎二匹，叠膺两朝异数，褒奖弥隆。君以进书受知，名闻当世，谓诸生无可报称，乃多刻所藏古书善本，公诸海内。至嘉庆十八年，年八十有六，所刻书至二十七集。未竣，而君以十九年秋卒。遗命子士恭继志续刊，无负天语之褒。君勤学耽吟，不求仕进，天趣清远，尝作《夕阳诗》甚工，世盛传之，呼之为鲍夕阳。元在浙常常见君，从君访问古籍。凡某书美恶所在，意旨所在，见于某代某家目录，经几家收藏，几次钞刊，真伪若何，校误若何，无不矢口而出，问难不竭。古人云读书破万卷，君所读破者，奚啻数万卷哉！”阮元对鲍氏家族史及其在杭州

的发展特色颇为关注，并对鲍氏在学术文化上的贡献也记载周详，云：“乾隆三十八年，高宗纯皇帝诏开四库馆，采访天下遗书。歙县学生鲍君廷博集其家所藏书六百余种，命其子仁和县监生士恭由浙江进呈。既著录矣，复奉诏还其原书。其书内《唐阙史》及《武经总要》皆圣制诗题之。皇上御制《内府知不足斋诗》云：斋名沿鲍氏，《阙史》御题诗。集书若不足，《千文》以序推。注云：斋额沿杭城鲍氏藏书室名。乾隆辛卯、壬辰诏采天下遗书，鲍士恭所献最为精夥。内《唐阙史》一书，曾经奎藻题咏，嗣后其家刊刻《知不足斋丛书》以《唐阙史》冠册，用周兴嗣《千文》以次排编。每集八册，今已十八九集，可为好事之家矣。”^[37]前述马裕献书最多，此则士恭“所献最为精夥”，一最多，一最精，也是对旅外徽商文化贡献至为精当的评价。后来，鲍氏父子还在浙本《四库全书总目》的刊刻和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校勘和维护过程中，不仅“输资鸠工”，且“司校讎之役”，与阮元和汪中等学者一起校订了阁本书中的许多错谬。

鲍氏家业由治坊而逐渐转为书坊，不仅透露了一般徽商自幼熏染出的儒家人文情怀，而且对传统典籍的传承、保护和传播也具重要的文化贡献。特别是在《四库全书》编纂的征集阶段，杭州鲍氏与扬州马氏家族主动积极献书，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江浙一带私人藏书家献书的积极性，因而也特别受到嘉奖。据《浙江巡抚三宝奏鲍士恭等五家呈献遗书等事折》载：“兹据鲍士恭、吴玉墀、汪启淑、孙仰曾、汪汝璥等呈称：士恭等生逢盛世，家守遗经，恭蒙我皇上稽古右文，特下求书之令，恩纶渥布，艺苑腾欢，窃愿以私篋所藏上充秘库。谨将书目开呈，伏祈恭进，等情前来。”^[38]虽然朝廷明令“只取抄存，无须呈进”，但鲍氏等奉献之心确乎“芹曝之献，实出至诚”。至鲍士恭、鲍士宽以后，又以士宽之子鲍正言为核心，与鲍正身、正勋一起承继藏书和刻书的祖业，历经战乱与贫穷，直至清末而衰落。他们虽为书商，更是文人，不仅自己“好古绩学，老而不倦”，而且“世衍书香，广刊秘籍”，已经完成了从商人到文人的完美蜕变与转型。鲍氏献书之业绩与刊刻《知不足斋丛书》之艰辛，业已成为学术文化界代代相传的佳话，其成就和影响也足以代表旅外徽商在两浙一带所创立的经济和文化业绩，体现出这群“贾而好儒”的旅外徽商充实而又极具意义的人生镜像。鲍氏的卓越成就也给徽州本土的居乡士子以极大的自豪和鼓励。许承尧曰：“渌饮以巨富居浙，藏书、进书、被奖，皆与汪切庵同。汪传印，而鲍刻书，同时所成就皆极大，真所谓乡里珍闻也。”^[39]

四、结语

清朝的盛世催生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地商帮如雨后天春笋般乘势而起。徽商相对于其他商帮而言，除了垄断两淮盐业的大部分营销权之外，在人文关怀和文化贡献等方面也优越于其他商帮。他们中的多数人因个人命运和家族经商原因，几乎终生“贾而好儒”“亦儒亦贾”，即自幼苦读经史，以图“学而优则仕”；长大后或因科举不中，转而四处经商；或登上仕途后，为了家族利益而插手商业活动。因此，徽州的士子、商人和官僚三者是流动不居且混而不清的，但他们的共同点在于：第一，大多是旅外徽商家族；第二，文化程度普遍很高。何炳棣曾详细地考察过清代社会流动与科举文化的关系，指出“从1644年到1826年，徽州府以519名进士而自豪，不过其中仅有142人是在本府注籍的。倘若将所有本地中式子弟包括在内，那么它无疑将名列前五或六名。然而，一旦寄籍他乡者不计在内，它便远远落后于全国的领先者”^[40]。这说明徽州人通过经商、科举、出仕、游学、移居等诸多途径，在经历外界环境的激荡之后，能够在物质财富与精神追求两方面都得以全面提高和发展，不仅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而且在学术文化、科学技术诸多方面都显示出丰厚的文化内涵，展示出时代的最高水平，引领时代风气之先。余英时曾对这种士商不分的特殊现象有所论述，认为如果保留商人“士大夫化”的概念，那就必须加入士大夫的“商人化”概念，这在明清语言中本是同时出现的，即“贾而士行”和“士而贾行”。虽不免带有道德判断的意味，但我们无论是说商人“士大夫化”，或是士大夫“商人化”，也都只限于客观的描述，在道德上是完全中立的。如文人润笔费所涉及的辞受标准的修改，便是商人化的一个具体例证。士大夫商人化在当时也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社会现象。不但小说戏曲的流行与之有关，儒家社会思想的新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商人化的刺激^[41]。这些旅外徽商摒弃了“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传统观念，凭借顽强不屈的毅力、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执着的文化追求，既为自己找到了生活门路、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也为寄居地学术文化的发展营造出浓郁的人文环境。“商成帮，学成派”乃至“无徽不成镇”的民谚，都说明徽州商人凭借“徽骆驼”的实干精神和对人文艺术的依恋和酷爱，在历经数十年的经营发展后，便逐渐融入土著，并以“士商异术而同志”的特性而获得多方面的提升与超越。

我们研究这些旅外徽商，通过梳理和展示他们崇尚文化和科举仕途的心路历程，揭示这些徽商家族在文化教育、学术研究

及《四库全书》编纂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对于今天我们继承传统，发掘徽商的文化精神，推动当代社会经济与学术文化的繁荣昌盛，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价值和现实启示意义。

注释：

[1]方苞：《王彦孝妻金氏墓碣》，《方苞集》卷1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04页。以自署郡望来确定是否属于徽商之旅外者，不失为一种较为稳妥的办法。本文所论徽商多以其本人或子孙著述中的籍贯署名，如“古歙某某撰”“新安某某记”等来定其为徽州人。

[2]戴震：《戴节妇家传》，《戴震全书》第6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440页。

[3]许承尧：《歙事闲谭》，合肥：黄山书社，2001年，第618页。余金《熙朝新语》卷5记载：“朱竹垞游扬州康山，有‘有约江春到’之句。后六十余年，康山主人江颖长春修葺其地，恭迓翠华临幸，极一时之盛，其姓名恰与竹垞诗句合，亦奇。”

[4]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865页。

[5]江春：《人日集寓心堂送戴东原计偕北上》，《随月读书楼诗集》卷上，嘉庆九年刊本。江春为《四库全书》编纂做出的贡献，可参阅《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相关奏批文档案条目。

[6]许承尧：《歙事闲谭》，第619页。

[7]阮元：《淮海英灵集》乙集卷3之《马曰琯》，“丛书集成初编”本。

[8]汪楫字舟次，徽州人，寄籍江都，工书法，举博学鸿词，授检讨，曾充封琉球正使，著有《琉球使录》，其子汪寅衷也因援例而候选儒学教谕。马曰琯则因入京祝皇太后生日而获候选主事，时人多称之为“主政”“刺史”，其弟马曰璐为候铨知州。如此捐官得爵便是提高社会地位和晋升望族的重要途径之一。

[9]《清史列传》卷71《马曰琯》，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关于马氏的藏书、刻书、编书和著述，可参阅卞孝萱《从〈扬州画舫录〉看清代徽商对文化事业的贡献》和冯尔康《明清时期扬州的徽商及其后裔述略》（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徽学》2000年卷，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2页。其他条目涉及马裕者还有闰三月十五、二十、二十八日，四月初六、初八、十一、十三、十九日诸条。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87页。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03页。马裕即马振伯，“扬州二马”之后颇能隆起家声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4载其事曰：“乾隆三十八年奉旨采访遗书，经盐政李质颖谕借，其时主政已故，子振伯恭进藏书，可备采择者七百七十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88页）

[13]《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上谕“内阁赏鲍士恭等《古今图书集成》”。关于旅外徽商几大藏书家事迹，可参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5。又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乾隆四十二年六月十五日两淮盐政寅折”：“李质颖先后进呈六次，共钞、刻本一千七百八部，内九百三十二部系总商江广达等访购，其七百七十六部皆商人马裕家藏。”又“乾

隆三十八年四月十三日浙江巡抚三宝折”：吴玉墀家献书三百五种，汪汝璥家献书二百十九种等。

[14]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42页。

[15]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士与中国文化》，第467页。

[16]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士与中国文化》，第531页。如果把学者文人和艺术家以知识能力获得经济收益（如润笔费，文物鉴赏、字画篆刻的鉴定费等），也视为商业行为的话，那么明清徽州“士与商的界限”确实非常模糊。

[17]李斗：《扬州画舫录》，第231页。

[18]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746页。

[19]阮元辑：《两浙轩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38～541页。

[20]《清史列传》卷71，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781页。

[21]光绪《嘉兴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据今《四库全书》研究者的统计，汪如藻家献书实际上前后共计二百七十余种。

[22]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334页。

[23]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第422页。作为商人的汪启淑，行迹遍南北，故李斗《扬州画舫录》、嘉庆《松江府志》、道光《歙县志》、民国《杭州府志》等皆有其生平业绩之载记。汪氏其书，今亦常见，可参阅。

[24]李斗：《扬州画舫录》，第224页。

[25]参见李斗《扬州画舫录》卷2、卷10。

[26]时人称徽州印学家巴慰祖、程邃、胡唐、汪肇龙为“歙四子”。今人沙孟海所撰《印学史》，以一章内容为程邃和巴慰祖立传，并附以汪肇龙、胡唐、巴树谷及董洵为后学传承。此事与极具特色的清代皖南学术思想之“皖派”得名几乎同时，也可谓桴鼓相应。黄宾虹《与李壶父书》言：“皖派折心石如，白文为佳，若吾乡垢道人、巴予籍二公，非特开西泠之祖师，而且阐古玺之秘奥。”

[27]李斗：《扬州画舫录》，第180页。此中所言“休园”，乃歙县长龄村人郑景濂、郑之彦、郑侠如三代人及同宗郑潮和郑沅、郑鉴元和郑钟山兄弟等所建，为扬州郑氏家族聚会之所。

[28]李斗：《扬州画舫录》，第346页。

[29]李斗：《扬州画舫录》，第345页。

[30]袁枚：《随园诗话》卷12，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31]《清史列传》卷72《程晋芳》。按，引文中“从叔”当为“从祖”。对于程晋芳的善交友而自毁家，翁方纲有诗赞曰：“载书西笑尚游遨，半世声名苦太劳。白璧琢成功更粹，黄金散尽气仍豪。”时人戏言：自竹君（朱筠）先生死，士无谈处；鱼门先生死，士无走处。

[32]许承尧：《歙事闲谭》，第70页。

[33]翁方纲：《翰林院编修程君晋芳墓志铭》，《碑传集》卷50，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34]李斗：《扬州画舫录》，第346页。

[35]程晋芳：《程先生廷祚墓志铭》，《碑传集》卷133。

[36]程晋芳：《程先生廷祚墓志铭》，《碑传集》卷133。

[37]阮元：《知不足斋鲍君传》，《研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94～495页。有关鲍氏藏书研究，可参阅刘尚恒《鲍廷博年谱》和周生杰、杨瑞《鲍廷博评传》等。

[3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97页。

[39]许承尧：《歙事闲谭》，第308页。

[40]何炳棣：《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41]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士与中国文化》，第542页。余氏所论于明代歙县汪道昆所言应该有所借鉴。汪氏《太函集》有言：新安人三贾一儒，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得其利则为子孙计，弛贾而张儒，迭相为用，以成贾得厚利、儒获名高之效。